

# 王實甫身世述臆(上)

朱君憶

## 一、弁言

明初寧獻王朱權於其太和正音譜中，評關漢卿之曲，以為「乃可上可下之才，蓋所以取者，初為雜劇之始，故卓以前列。」兩時代較前，元人鍾嗣成的錄鬼簿所載之諸家，姓字(名)亦早以關氏居首，歷來學者對於此點，都有同一公認的結論。然而自王靜安先生，即以爲「漢卿時代，頗多異說。」(註一)，今人盧元駿教授於其關漢卿考述一書中，曾加歸納，其異說大致可簡分為三：一、據元鄭經：青樓集序，元楊楨鐵崖：元宮詞之二；明蔣一葵：堯山堂外紀等書，以爲關氏乃金之移民，金亡不仕，大抵生於一二一〇年左右。其二則以青樓集(明天一閣說集藍格抄本)元胡祇山：紫山大全集；元：王惲：秋澗集；賈雲石：楊春白雪序；元楊朝英：太平樂府集；元胡正臣：樂府羣玉所載元盧疏齋(摯)與珠簾秀：散曲贈答；元周德清：中原音韻，元危素：危太樸續集等書爲據，以爲關氏乃純粹元人，嘗生於一二四一—一二五〇年之間。而最末一說，盧氏則據近人胡適之先生「關漢卿的時代」、「關漢卿是金遺民嗎」等文，佐以青樓集等不同的版本認爲：「他(關漢卿)可能是生於金末長於元初和白仁甫(樸)差不多，或者比仁甫(一二

二六—：)六七、八歲。」也有人認爲他是金末元初的，這就是說他是由金入元的，我們以爲這一說似乎比較合理，比較接近事實。」(註二)而令人王忠林、應裕康二教授，於其近著中，卻對關氏之年代，仍主第一說，而深信：楊楨：元宮詞之二：大金優諫關卿在，伊尹扶湯進新篇。」(註三)使王靜安先生懷疑：「漢卿固殆事金源矣。」之說(註四)，此說王先生以爲：「馬致遠漢宮秋雜劇中有云：『不說它：伊尹扶湯，則說那武王伐紂。』案武王伐紂，乃趙文殿所作雜劇，則伊尹扶湯，亦必爲雜劇之名。」(鄭光祖雜劇目中有之)馬致遠時代，在漢卿之後，鄭光祖之前，則其所云伊尹扶湯，自當爲關氏之作，而非鄭氏之作。」理由是相當有力的，何況楊楨元泰定帝丁卯年(一三三七)即中進士(註五)，上距世祖至正之末三十三年，他又曾館於青樓集作者夏伯和家中，和作過：周月湖今樂府序、沈氏今樂府序、優諫錄序、朱明優戲錄序等文的戲劇愛好者(註六)應該不會記錯此劇的作者；而盧元駿氏卻以爲元世祖命優人碩德(或作石德間)作白翎雀曲，而碩德即爲關卿之說，也似乎未能使人鑒望；不過我們若逕認關氏生於一二一〇年左右，假定其二十歲後仕金以迄金亡，則此時期恰爲金宣宗至金哀宗之末的二

三十年間，完顏氏正值戰敗、篡弒、遷都、被圍，喪亂中救死不暇的時期，實在不該是產生雜劇的時代而言，則盧氏之說亦即一般文學史家所公認的主張，我們是仍應暫時承認的。然而關漢卿在元劇作家中，不但是「初爲雜劇之始」(一至少專業作劇的文人，沒有早過他的。)而且他的作品多達六七十本(註七)，數量也遠過其他諸家，對當時戲劇影響之大，不難想見，而元人有關記載他生平著作，雖只東鱗西爪，卻亦不在少數；然而時至今日，我們對他生平的年代，尙難作確定的結論，又遑論其他諸家？我由此臆測元初劇家身世之難以鉤稽，可能有下列兩個原因：

甲、職位卑微文獻難徵：王靜安先生曾謂：「士大夫之作雜劇家，惟白蘭谷(樸)耳，(其實白氏終身仍爲處士，由於子貴受元廷封贈)，此外離劇大家如關、王、馬、鄭等皆名位不著，在士人與倡優之間。」又以為：「有元一代之雜劇，可分爲三期：一、蒙古時代；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後，至元一統之初，錄鬼簿上所錄之作者五十七人，大都在此期中。其有雜劇存於今者，中如：馬致遠、尚仲賢、戴善甫，均爲江洲行省務官，姚守中爲平江路吏，李文蔚爲江州瑞昌縣尹，趙天錫爲鎮江府判，張壽卿爲浙江省椽吏。」趙

文殿，則教坊色長、張國賓、花李郎、紅字李二俱爲倡夫，第一期劇作家中，他們則顯然的且均是優伶了（註八），日本學者青木正兒亦說：「然彼貴顯諸人，只作小令套數耳，未見雜劇的作品。」（註九）這些話，雖然偶然也有少數例外，像第一期作者中，史九敬先，或作史九敬人，（其莊同夢近始發現），他即史天澤之九子史樟——少壯曾貴爲眞定萬戶和武昌萬戶——若第二期一統時代，（自至元至至順，約一二七七一—三三二）如宮大用之爲書院山長，金仁傑爲建康崇寧務官，鄭德輝（光祖）則杭州路吏，曾瑞（瑞卿）、喬吉（夢符）均朱釋褐，除了樂郊私語所記之楊梓，餘人則非椽吏即爲平民，更無一個元代高級官員。迨至末期，秦簡夫未仕，蕭德祥業醫，朱凱、王睡則均不仕，其雜劇未能傳世者，吳仁卿曾官府判，高克恭縣尹，黃公望（即大畫家大痴山人黃子久）爲浙西憲令，他們已經是比较顯達的了，餘人則如非椽吏，亦均布衣而已。即以錄鬼簿的記載內容而言，各人的生平，亦脫不了遠略近詳的窠臼，所以然者，初期諸人的歷史，早已隱昧難稽，假定我們以關氏生於一二二〇—一二三〇年之間言，則貫雲石序楊朝英陽春白雲以「關漢卿、庾吉甫造語妖嬈，如少美臨杯」；和元人這第一部散曲選，乃是最高提及這初期二位雜劇家姓字的文字，然而上距關氏之生已溯近百年了。元末鍾嗣成的錄鬼簿自己更有：「余生也晚，不得預於几席之末，不知出處，故不敢作傳以弔云。」早已說明了較早的雜劇家身世，早就文獻難徵，而文獻所以難徵，亦正以他們職

位卑微之故。尙幸由於彼「貴顯諸人只作小令套數耳」的關係，楊春白雲、和稍晚的樂府羣玉（註十）兩部較早的元代散曲選集中，若干初期、二期的雜劇家，如關漢卿、石子章、庾吉甫、侯正卿、白仁甫（樸）、馬致遠（另有東離樂府曲集）、王伯成、鄭廷玉、高文秀、紀君祥、李壽卿、趙天錫、鄭德輝、喬夢符、趙文寶等，僥倖靠了兼工散曲的關係，才先於錄鬼簿而傳下了姓字（名）。

乙、理學與文學思想的結合，加強了對雜劇的壓力：我們綜觀元人各期雜劇的作家，也並不絕對是毫無貴顯人物，然而卻使人難免詫異的有元一代中，其貴顯者卻僅有兩人，一爲初期時代官居眞定萬戶、武昌萬戶的史九公子樟（鍾書錄載其字敬先），二爲封侯、賜諡爲顯晉，中期的楊梓，二人並均於元史略見姓名（一見史天澤傳，一見爪哇傳），而此兩人，卻意外的竟都是武人；但文而達者，操翰雜劇之士，竟然百年來尙無一位；這固因郎廟之士，不願消耗太長的時間；可能無暇及此。但是當時漢族的正統文人，雖然屈節元廷，但他們的文學思想，則仍傳襲了程、朱前輩周茂叔，「文以載道」的餘說，我們且試看後引的片段：「朱震亨、字彥修、義烏人，初爲聲律之文，刻燭而已；又棄去爲任俠，壯則悔之，遂往從白雲（許謙）於金華山中：於浮豔之詞尤不樂，直以吾道蠹賊目之。」「方用字希才，望江人，少負逸才，與朱公遷、揭傒斯、歐陽元同遊於許白雲之門，以翼斯文相砥礪，時稱「許門四傑」、一合則不花，蒙古人也，官浙

江台州達魯花赤，嘗遊於白雲之門，其學以誠意不欺爲主。」我們再翻翻同書的元代前期，則可見：吳師道、柳貫、吳澄、程文海、趙孟頫、戴表元、袁梅，都以文學名家，則身理學金榜（註十一）而這些人的時代，有的固正與初期雜劇家並世（如程文海、戴表元等），有的則亦緊接在後（如趙孟頫、吳澄、揭傒斯、歐陽玄等），可見當時雜劇名家在他們的眼裡又能佔幾何份量？另外的話，也給我們說明了兩點：按朱震亨即元代名醫朱丹溪，他本身雖亦屬於方技之流，但既經程朱理學的薰陶，便目浮豔之詞爲吾道蠹賊，更何況多以兒女私情，豪俠犯禁或釋道幻化作爲內容的雜劇？其次從合則不花的這個例子，也可見當時沙漠鐵騎，雖然力能混二南北，而氈裘貴裔，也仍傾心於性理思想的園地。這些情形，雖是僅指東南而言，然而鞏固之下的北方，也正在趙復被俘入燕之後、姚樞、許衡、力播程、朱之學的時候，所以除了一、二武人如史樟、如楊梓可能受了「國王出師，亦從女樂隨行？」（註十二）將教坊司置於正三品的高位（註十三）和詔：「翌日，都督與高麗使人每（們）就省中戲劇者。」（註十四）的鼓勵，對雜劇才偶然爲之，可是王惲仍謂史九公字：「恥以藝進，與時推移。」（註十五）而楊梓則家於海鹽，距杭城匪遙，鍾氏之錄鬼簿對之竟不載有隻字，也許史、楊他們都是漢人的知識份子，仍只好屈服於思想的壓力而自晦罷？由於以上兩點原因，這說明了元初雜劇家之身世，即元人本身，欲作稽考已自不易，而後世學者對他們生平，所難以抉微燭隱的，又不外兩點：

壹、史料難據：雜劇家主要史料之錄鬼簿、與太和正音譜兩書，前書作者鍾嗣齊遠居浙杭，對此燕、并遺事固已自述：「余所編撰，余友陸君仲良，得之於克齋先生吳公，然亦未盡其詳：」，足見其書資料僅係輾轉口傳；而書中謬誤可以概見者：如白仁甫（樸）本籍陳州（山西河曲附近），此書乃稱之為真定人，可能因其卜築滹陽的關係；然而其後對白氏移家金陵，卻又擱置不提；史九敬先，本係永清人，卻因其曾官真定萬戶，而遂謂其「真定人」；馬致遠，王靜安先生於其錄曲餘談中，謂為同時有二：一為金陵人，（見張以巖翠屏集）、一居大都；然以筆者所知，元王惲：秋澗大全集十五、十七卷碑陰先友記中尚有「馬寅字致遠，許州人，性雅重，嗜古學，恬於仕進。」按王惲生於金哀宗正大四年（一二二七年）馬氏則一般學者均以生於元世祖中統之先（一二五〇年前後），如其先王惲而卒，則二人為友非不可能，而錄鬼簿中之馬致遠，曾為江浙行省政務官；翠屏集中之馬致遠則曾為廣西憲掾，而今傳東離散曲「金字經」之一：「夜來西風裏，九天鵬鵬飛，困煞中原一布衣，悲！故人不知？登樓意，恨無上天梯。」以個人臆測：「九天鵬鵬飛」，未嘗不是指的王惲等人之從龍驟貴，若「中原一布衣」，則許州恰居「中原」，這樣說來馬氏不過是為逐食，薄宦南北，一度流寓大都而已，錄鬼簿所記籍貫，可能又是不正確的。而更有進者：王靜安先生錄曲餘談同文中：「張鳴善：一見王逢梧溪集，名擇，平陽人，官江浙提學，謝病隱居吳江；錄鬼簿亦有張鳴

善，揚州人，官宣慰令史。」以為是同名二人，但今傳松江夏伯和青樓集尚有「：至正丙午「頑老子，張擇鳴善謹序。」，則又顯然平陽、揚州同時、同姓、同名、同字，又同愛雜劇，必為一人；而吳江又距松江甚近，揚州則遠隔長江，往還不便，大概鍾氏將籍貫記錯了。而楊梓以元代武將封侯，所居近在海鹽，又時代相接，鍾氏此書竟未見錄，乃大疏漏。其次的一部書太和正音譜，今亦節引吳瞿安（梅）先生之指謬如下：「：而且照我看來，所列各人頗有懷疑，內中杜善夫，元遺山明明是金朝人，如何放在元人隊裏？但此還可說失于檢點的。至于董解元是人人知道，偏偏說他仕元，始製北曲，還不是更可笑麼？」：「這位寧獻王老伯，做這部正音譜的卷首一卷，竟有隨筆亂寫，這一百五人中，也有寫名的，也有寫字的，也有寫官爵的，夾七夾八，實無體例，已覺得可笑了；還有十二分的糊塗處如：劉時中同劉通齋，曾褐夫同曾瑞卿，吳克齋同吳仁卿，王敬甫同王愛山，明明都是一個人，他卻分為兩，當他是兩個人；而且把吳仁卿擱在十二位中，將吳克齋放在百五人中，同是一副眼睛，對於同一個人，卻分出這樣高低來，這實難和他辯說。」（註十六）

禮陽春白雪（詞選），劉時中，元世祖本紀以劉時中為宣慰使，宣慰大理，一號通齋官至翰林學士，有散曲載楊朝英：陽春白雪中，世祖武臣有趙天錫冠氏人，元史有傳，製曲之趙天錫則其人，駁辨錄載宛邱趙天錫為吾丘衍買妾事，或即其人也。馬致遠一大都人即東離；一金陵人，馬琬文璧之父，見張以巖翠屏集，秦簡夫一名，略與元遺山同時，而輩行較長；一即製曲之秦簡夫，錄鬼簿，所謂「都下擅名，晚歲來杭者也。」張鳴善一見王逢梧溪集，名擇平陽人，官江浙提學，謝病，隱居吳江，錄鬼簿亦有張鳴善，揚州人官宣慰令史，則製曲者也；賈仲明，太和正音譜以為明初人，然吳師道禮部詩話云：「子靜初拔其鄉書至京謁賈仲明。則元時又有一賈仲明（按元史：賈居貞，字仲明，有傳）矣。」（註十七）其實散曲亦有同名者，除王氏會謂：「白黃汴人，見元好問中州集，一隴州人：仁甫伯父也；見元遺山善人白公墓表；一錢塘人字无咎，白挺之子：此即製曲之白無咎也。」（見前註）另如筆者所知，關友王和卿大名，見於元人陶宗儀：南村輟耕錄，其（醉中天）咏大蝴蝶一曲，曾膾炙人口，而王惲秋澗大全集中堂事記卷八亦有：「王和卿太原人，右房省掾。」而其時代亦正復相當；又吳瞿安先生，所引「郝新齋，名天挺字繼先，出于柔魯別族：嘗受業于元遺山，按金史隱逸傳：「郝天挺字普卿澤州陵川人：遺山嘗從受業。」這又巧合得使人驚異了。從這些看來，要去辨析元初劇家的史料，已足眩迷眼目，何況另外還有不少人僅留作品而佚失了姓名，

如以關漢卿當時而論，他不僅未有姓名（字）雷同的困擾，元人關於他的記載，除了不及白仁甫的完整以外，如周德清的中原音韻自序，真雲石的陽春白雪序，鬼董的錢爭一序，熊自得的析津志，鍾嗣成的錄鬼簿，以及楊維禎的沈氏今樂府序，夏伯和的青樓集，和陽春白雪、樂府羣玉、太平樂府朝野新聲等元人散曲選集中所採錄的關氏作品，和他十七本完整的雜劇，另外留傳的三本殘劇（註十八）其年代里居和身世已儘足規其輪廓，而成專書，實在是相當幸運的。若以較同負盛名另一大家王實甫而言，王氏生平僅以寥寥「王實甫大都人」或加「名德信」九字，始見於元末鍾嗣成的錄鬼簿；「王實甫之詞如花間美人。」十字繼見於明初寧獻王朱權的太和正音譜，其生平已足使後人鉤稽為艱，何況在王靜安先生錄曲餘談第十五：「元曲家同姓名（字）」之後，也繼續發生了同時代、同姓名、同姓字的問題，然而我的管見；這雖然是學者們辨析實甫身世的一個困擾；但是從另一面說，也未嘗不是從謎面進入核心的一條途徑，筆者敢申鄙慮，以明此說：

二、王實甫其人為誰？

過去由於王氏姓名身世，既不見於任何同時文獻，而其後可據的史料，記載又十分的簡略；首先懷疑「大都王實甫」即為「大名王和卿」的始於明人無名氏的識餘一書之卷二：「王（和卿）所賦詞亦佳，又以滑稽桃達與關善，得非即所謂實甫者，以先開卒，故西廂記未成，而關續之耶？此事理極易推，惜無他據。」然較後之明末

胡應麟：少室山房筆叢：亦採此說原文，而竟不言出處。然今人盧元駿教授則據危大樸續集：關友王和卿卒於延祐七年（一三二〇），是則如以王氏逝世後，關曾戲謔而言，即從關生於一二二〇—一二三〇年之說，則關氏已年滿百歲，亦滋可疑，而和卿作品，散曲以外，諸書均不言作有傳奇，至若他的曲調風格如：「我嘴搵著他的鬚髻，他背靠著我的胸皮；難道香腮左右俱，只索項窩裏，長吁氣，一夜何曾見他面皮，只是看一宿牙梳背。」「醉扶歸」又：「一個胖雙郎，就一個胖蘇娘，兩口兒都是熊模樣，成就了風流喘豫章，繡幃中一對鴛鴦象，交肚皮厮撞。」「撥不斷」——（註十九）此類白描之作，跡近俳優打諢，與「研鍊、濃麗」的王實甫風格，更相距遠矣；如此這二王又怎可相址為一？

然而近代另一新說則牽涉同名問題，這創於我國小說史，權威孫楷第先生：「余於蘇天爵滋溪文稿中，偶發現「王德信名。」如即曲家王德信，則王實甫乃王結之父。結元名臣也。而滋溪文稿件二十三「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」載結事尤詳。行狀記其家人事云：「……父德信，治縣有聲，擢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與臺臣說不合，年四十餘即棄官不復仕。累封中奉大夫、河南行省參知政事，護軍，太原郡公。母張氏封大夫郡夫人。」天爵文作於重紀至元三年，記結父母皆有封而無贈，知重紀至元三年，德信與其妻張氏猶存，度其時，年至少亦近八十，可謂老壽，元史王結傳，多本天爵所為行狀，獨削德信事不書，……不讀天爵文，固不能知德信是結

之父也。」但王忠林、應裕康二教授，近駁其說的理由，以為：「孫氏所據行狀只有其名巧合，里籍既不同，又無其他事蹟足以證明，實甫以曲名家，工於文辭，行狀中既未言能作曲，亦不提工文辭；實甫以字聞於世，行狀亦未言及其字。元實仲明「凌波仙」詞稱揚實甫說：「風月營，密匝匝列旌旗；鶯花寨，明廳廳排劍戟；翠紅鄉，雄糾糾施謀智。作詞章，風韻羨，士林中等輩伏低。新雜劇，舊傳奇，西廂記天下奪魁。」可見實甫在當時是以詞章名著於士林的，而且其人和他的生活，也是風流浪漫的，也不像個做監察御史的人。再加王實甫和關漢卿、白樸同時，其生年可能比關漢卿還要早，我們推測要在西元一二八八以前，可是照孫氏之說，重紀至元三年（一二三三七）王實甫還活著，年近八十，推算上去，他當生在二二五七年，要比關漢卿晚了四十多年，比白樸也晚了三十多年，實在是不合理的。所以孫氏只以名同來牽附，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。

（註二十）尤有進者，筆者以為，我們還可以從四庫總目提要於王結之文忠集中，引用同時名臣張珪（宏範子）稱其「非聖賢之書不讀，非仁義之言不談。」而元史卷一百八十八王結列傳說：「武宗即位，以仁宗為皇太子，大德十一年，命置東官官屬，以結為典牧太監，階中大夫。近侍以俳優進，結言：「昔唐莊宗好此，卒致禍敗，殿下方育德春宮，視聽宜謹，……」按王結歷事元武宗、仁宗、英宗、泰定帝、明宗、文宗，而卒於順帝壽紀至元二年，設如其父德信即為實甫而又老壽，武宗時自應健在，他竟對太子如此痛斥俳

優，若遇反問，作何解釋？而且這位「非聖賢之書不讀，非仁義之言不談。」的君子，如此云云，又豈不是直對太子而間接嚴詞譴責其父？然而按錄鬼簿賈仲明之序，自云：「余因雨窗逸興，觀其前代故元夷門高士，醜齋，繼先鍾君，所編錄鬼簿：」「永樂二十年，壬寅中秋，淄川八十雲水翁賈仲明書于怡和養素軒。」按胡元於明洪武二年，退入沙漠，時為一三六九年，永樂二十年則為一四二二年，賈氏在元已為懂事的，愛好雜劇的二十五六歲之青年，王實甫凌波仙贊詞，自非信口開河，「名德信」三字，如係賈氏添入，則結父生平，似仍多少有存疑價值。若竟為明人據滋溪文稿竄增，那便謬以千里了。至於王應二氏年籍的理由，都不外傳統的看法，鄙臆則以為實未必俱當，於此敢抒管見，言其一：

### 三、王實甫時、地的困惑

王靜安先生於其宋元戲曲史，第九章元劇之時、地中，首謂：「與漢卿同時者，尚有王實甫。」又謂：「：實父生年，固不後於漢卿」，換言之，即謂、王同為由金入元時代之人物；其後支持此說的理由有甲說、乙說，今介其概略，并簡抒異見：

東 方 雜 誌  
甲、吳瞿安先生力主王實甫著：四丞相歌舞麗春堂，劇末云：「早先聲把煙塵掃蕩，從今後四方八荒，萬邦齊仰，賀堂今皇上。」以頌禱（金）章宗作結，則此劇之作，尚在金世。實父蓋亦由金入元者矣。」（註二十一），此後羣從此說者如：前有賀昌羣、陳鍾凡、鄭振鐸、諸氏

，近如王忠林、應裕康二氏均是。（註二十二）然今人吳一飛教授相反的卻認為：「當然麗春堂一劇內容是演金朝右丞相完顏從善被貶到還朝的故事，結局云云，可以作為劇中人身份來頌禱金主，而不能斷為劇作者的口氣，遽認王實甫在一二〇八年（金章宗死於這年）以前，已有作品發表。」（註二十三）且筆者更以為此類寫法，元人於雜劇中，亦非僅有，即如西廂第五劇使臣上、末唱：其末「錦上添花」：「四海無虞，皆稱臣庶；諸國來朝，萬歲山呼；行邁義軒，德過軒度；聖策神機，仁文義武。」又「公篇」：「朝中宰相賢，天下庶民富。萬里河清，五穀成熟。戶戶安居，處處樂土。鳳凰來儀，麒麟屢出。」這不是大同小異的家數以劇中人之口吻夾頌禱作結嗎？（另如無名氏：劉千病打獨角牛，亦以此方式作結。）

乙、添主新說者為今人盧元駿教授：「王實甫乃由金入元時代的人物，李直夫則為女真人，自然他們寫作麗春堂和虎頭牌的時候；必然會將女真風俗與女真譯語融會而入，那末反過來說：「善用女真風俗與女真譯語入劇的作家，亦可證明他是金人，或者由金入元這一時代的人物。」（註二十四）然而賈仲明乃由元入明劇家，其雜劇純粹寫女真故事的金安壽（度金童玉女）尚在元曲選庚集，我們固不得謂其係由金入元，且馬致遠雷轟薦福碑中，第二折：正末唱：「帶牌子的曳喇隨著。」曾用契丹語「曳喇」（勇士或僕從）我們又豈可據此即以馬氏為由遼入元的人物？所以這一點理由的基礎也是脆弱的。

至於錄鬼簿所載，初期元人劇家，作品現存，王靜安先生所錄者，連起始發現之史九敬先莊周夢等作者，當亦僅三十人左右，以言里籍固均屬北人，而北人以內，又以大都最多；然「捻雜劇班頭」「卓然前列」之關漢卿里居，尚竟有大都（鍾嗣成：錄鬼簿，蔣一葵：堯山堂外紀）祈州（乾隆新修祈州志）解州（邵遠平：元史類編等）三說，則餘人之是否均為大都，亦殊難確言，今人鄭審先生，雖擴大範圍，以元代「腹裏」所轄諸地，將大都作彈性的解釋（註二十五）比較以錄鬼簿所載諸家里居，用刻舟求劍方式去衡量姓字（名）相同者，是否即係其人，自是一大進步；然而尤有進者，鍾嗣成錄鬼簿資料，既自云得之「陸君仲良」，而陸仲良又由其師吳克齋所傳，則輾轉之間豈無謬誤？所以他也自餒：「不知出處，不敢作傳以中。」即以前述所錄張擇、鳴善而言，既同時、同姓、同名、同字、又同好戲劇，顯然即為一人，而又可能與鍾氏有所往還，近在耳目之間，竟誤平陽而為揚州，則該書所錄初期諸家里居，時當胡元混一南北，人物均必然交流，他們「真正里籍」，便亦易困惑了；綜上種種，可見王實甫之時、地，遲至今日未易遽作定論，亦不足為怪。筆者謹就個人所發現有關王氏的一文、一詩，略抒鄙臆，以就正於方家。

